

现代北京地理科普丛书

北京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北京地理学会主持编著



与北京城



朱祖希◎编著



中国地图出版社

现代北京地理科普丛书

北京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北京地理学会主持编著



与北京城



朱祖希◎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定河与北京城 / 朱祖希编著. — 北京 :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1.12

(现代北京地理科普丛书)

ISBN 978-7-5031-6297-8

I. ①永… II. ①朱… III. ①永定河—文化史—北京市 IV. ①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3088号

责任编辑: 刘洪涛

出版审订: 杨守一

装帧设计: 崔亚雷

永定河与北京城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3号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42mm × 210mm

字 数 75 千字

印 次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2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6297-8/G · 228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 (010-83060868) 联系。

如反馈图书信息, 请与编辑 (010-83060675) 联系。

前言

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

“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西文中Civilization一词译作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经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目前，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学者都公认，应当把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的具体标志。尽管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异，历史发展速度不同，致使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不整齐划一。然而，文明诞生的同时，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意味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人再持异议了。

城市，是人们所公认的人类四大文明标志之一。“没有城市，文明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人类在保持好生态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如前所述，无论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是什么，文明与享受文明，都必须依赖于物质生产者所进行的劳动及其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必须先有农民、牧民、渔民、伐木者、手工业者等生产者进行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才有了文明的开端。换言之，这些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剩余产品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开始出现所具备的必须条件。同样，没有这种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城市。而没有这种剩余产品的持续供给，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总是在具有肥沃的土壤，而且具有可靠水源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并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埃及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人们也普遍认为，埃及是名副其实的“尼罗河的赐予”。这是因为尼罗河这条延伸在北非广阔的黄色沙漠之中的翠绿色河谷，在人类历史上一一起着非凡的作用。它滋养了埃及5000多年的文明。而尼罗河三角洲和狭长的、肥沃无比的冲积平原，正是尼罗河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逐渐沉积而成的，甚至连埃及本身也是由来自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苏丹等国的“贡品”——水、淤泥和腐殖质造就的。正是这块肥沃的冲积平原，以及每年都要给补充的富含腐殖质的沉积层，不仅产生并滋养和维持了埃及悠久的文明，也产生并滋养和维持了埃及的首都开罗。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产生，正是由于它拥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及其所在流域富饶肥沃的土壤，这样一个既适宜于原始人类的生存，又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诚如尼罗河流域一样，两河流域所拥有的，具有超级生产力的土地使得农民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从田间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塑造了

巴比伦王国，从而才会涌现出众多的城市、壮丽的宫殿和神庙，各种艺术品、楔形文字、数学、历书、天文学、法典，以及其他文明进展的证据等等。

同样，印度的文明亦首先产生于具有优越自然条件和肥沃土壤的恒河三角洲。

纵观世界历史，追根溯源，人类似乎总是沿着这样一个模式在发展着自己的文明：每一种文明在诞生了它的土地上兴旺、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了这种文明的人们便会变得越来越开化。然后，他们发现当地原有的土地已不再能供养他们，于是就开始征服并夺取他们邻居的土地。他们利用这样掠得的新土地，使他们的文明持续了数个世纪。而当他们在达到了自身所能征服的极限之后，他们的文明就开始衰落，最后终于被周围的“野蛮人”所吞没，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以后一个新的文明又会在一些半开化的“野蛮人”所占有的土地上兴起，接着又重复着上述的模式。当然，这些古老氏族盛衰的具体原因和过程不尽相同：有的是被他们自己曾经驯化与教育过的半开化的“野蛮人”所征服；有的则被他们影响范围之外的“野蛮人”所倾覆；还有的则是被他们更强大、更文明的氏族所侵占。而在一般情况下，政治的腐败与经济失调，加速了这些古代民族的衰落与灭亡。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这种衰落总是出现在人类耗尽了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并支持他们生存的地力之后。

学者莱斯特·布朗也在《粮食危机毁灭全球文明》一文中也指出：表土“这层植物必须的，薄薄的营养物质，是文明的基础，需要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才能形成。但通常只有15厘米。风蚀和水蚀引起的表土层的流失，曾经毁灭过多个早期文明”。

历史事实虽然可以证明，覆灭的文明绝大多数是因为打了败仗，城市被毁灭了。但是，只要支持文明的资源还存在，那么在每次暂时衰落之后总是能够再一次建成新的、更加进步的文明。埃及、巴比伦、印度是这样，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地域相当辽阔，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又相当复杂，尤其是在文明起源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在祖国大地上争妍竞秀，而且常常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图景，为后来独特灿烂的华夏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例如，中国文明出现前夜的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上游地区，是继承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的氐羌文化区；在黄河中游地区，是继续仰韶—河南龙山文化的华夏文化区；在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则形成了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区；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具有湖北龙山文化特色的苗蛮文化区；在杭州湾两岸及太湖流域，存在着由良渚文化孕育形成的吴越文化；在燕山以东的长城

内外，又形成了由红山—富河文化为主的燕辽文化区。考古研究证明，在上述六大文化区中，中原华夏文化区在中国文明即将诞生之前，便已居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它在未来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坚实基础。这不仅是因为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既具有温暖湿润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及松散肥沃的土壤，而且其土壤的肥力远远超过了其他流域、地区。这便是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文明摇篮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而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前1000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中原地区，且是沿着长安—洛阳—开封这一东西向的轴线呈徘徊式的移动；后1000年中才逐渐向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南京—杭州地区转移。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也孕育了代表人类文明的城市。

“城市”一词。最早见之于中国典籍的，当推战国时期的史籍之中。《韩非子·爱臣》云：“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但是，在实际上“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在古代是指在一定的地域上，以武器“戈”守护用于防卫而筑起的城墙。“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城为保民为之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所以，这时的“城”实质上只是一座具有防御性的“城堡”，它仅仅是作为统治中心而存在的。在古代诸凡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

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称“城”。“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即买卖交换商品的场所。“市”本于象形文字——上面的一点”原是一个招幌，下面是柜台，柜台车间挂有一个称钩。“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防御功能的“城”与商品交换的“市”已经结合到了一起，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一词。然而，“城”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语言中形成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词，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私有财富的出现和积累，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的斗争，筑城自守就显得非常必要，“城”也便应运而生。而在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城”的记载，诸如“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黄帝筑城造五邑”，“夏鲧作城”，“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以城郭以始也”等，也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多座城址，如城子崖、后岗、王城岗、平粮台等。这些城址大都是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个别可达中期。这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古史传说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如果从“城”的最初只能主要是为防御而论，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就已有了防御性的设施。例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的四周都发现有人工挖掘的壕沟，并在壕沟内侧

设有栅栏。它们所起的防御作用，与早期“城”的功能是一样的。那么，仰韶文化时期居址四周的壕沟和栅栏，作为中国城池的萌芽或征兆，也是完全可以的了。

商代的城在古代的文献中屡见记载，商丘、亳、殷、朝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都城，且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如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黄龙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河南安阳殷墟等等。这些城的规模都比较大，而且在城内外都有规律地分布着宫殿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等。从古代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商代已经有了专门交易的场所——“市”。

“市”内还有各种各样的“肆”。“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太公贫困，负贩于朝歌”，相传姜尚在未遇文王之前，就曾在朝歌和孟津市肆内做负贩、屠宰、卖酒的营生。

由此可见，在商代的城中，已经出现了“市场”，这似乎已是毋庸置疑的了。不仅如此，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商城、殷墟、盘龙城、偃师商城等，不仅都是商代的都邑，即在客观上已成为当时某一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而且也已经具备了城市的经济性质，即除了上面所说的“市”已出现而外，还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品交换中作为等介物形态的货币——贝，亦已经普遍流通。

例如，在郑州商城南北，曾发现制铜作坊遗址。城南的总面积约为1050平方米，且主要出土镞范和斨（Qī ā ng，古代的一种

斧子）范；城北的面积为275平方米，主要出土刀范和戈范。此外，该城还发现了一处面积达1400平方米左右的制陶作坊遗址，出土陶范三四千块，但主要出土盆、甗为主的泥质陶器。而在城北发现的一处制骨作坊遗址，在其中一个窑穴中就出土了1000多种骨器成品、半成品及骨料，其中绝大多数是镞、簪。1958—1959年曾在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发掘的铸铜作坊遗址，其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三四千块，而在北辛庄发现的制骨作坊遗址，仅发掘的面积就达247平方米，在其中的一个椭圆形骨料坑中，出土的骨料、废料和半成品等就多达5000余品，且以骨筭（Jǐ，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和筭帽为最多。再从手工业的产品来看，1938年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宽78厘米、长110厘米，重达875千克。这种巨型铜器，在当时的铸造水平下，至少需要300人以上同时操作才能完成。

上述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和遗物，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这些城市中发达的手工业，及其规模、分工，其产品也不是专门供作坊主自己使用的，而是为了交换。所以，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手工业。据《左传》春秋定公四年（公元前585年）记载，周初曾俘虏了许多有固定手工业技能的殷民，其中有索氏（绳工）、长勺氏、尾勺氏（酒器工）、契氏（篱笆工）、终葵氏（锥工）等。如果把这些记载与商代城址周围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商代城中的手工业至少已具有了青铜制造业、制陶业、骨角牙蚌制造业、玉石业、纺织业、酿酒业、建筑业、木漆制作

业、编织业、制革业等十几个门类了。

商代手工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兴起，必然会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在商代的墓葬中，无论是王公贵族的大墓，抑或一般平民的小墓，都发现有殉贝现象。例如，在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座商代大墓中（M1），曾发现了2790枚海贝；安阳小屯一座中型墓（M5）中，亦曾发现了6000多枚海贝；近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有近7000枚殉贝。可见，贝已作为一种财富，为奴隶主贵族所敛聚。同样，在一些中小奴隶主的墓葬中，亦有殉贝的现象，如郑州白家庄一座墓（M7）中，就有殉贝460多枚；安阳殷墟M272和M261号墓中，分别殉贝350枚和263枚。在一些平民的墓中也不乏殉贝现象，1952年在安阳大司村发掘的160座平民墓中，其中83座殉有贝；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的800多座墓葬中有336座有殉贝。这些现象不但反映了这些墓主人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而且也反映了占有者的权力和身份。

商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货币的出现，而货币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繁荣。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发掘到的大量海贝、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大龟和玉制品等遗物，皆非本地所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无疑是交换而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玉，盛产于新疆，海贝和大龟盛产于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可见，商代已与遥远的外地有了较为广泛的贸易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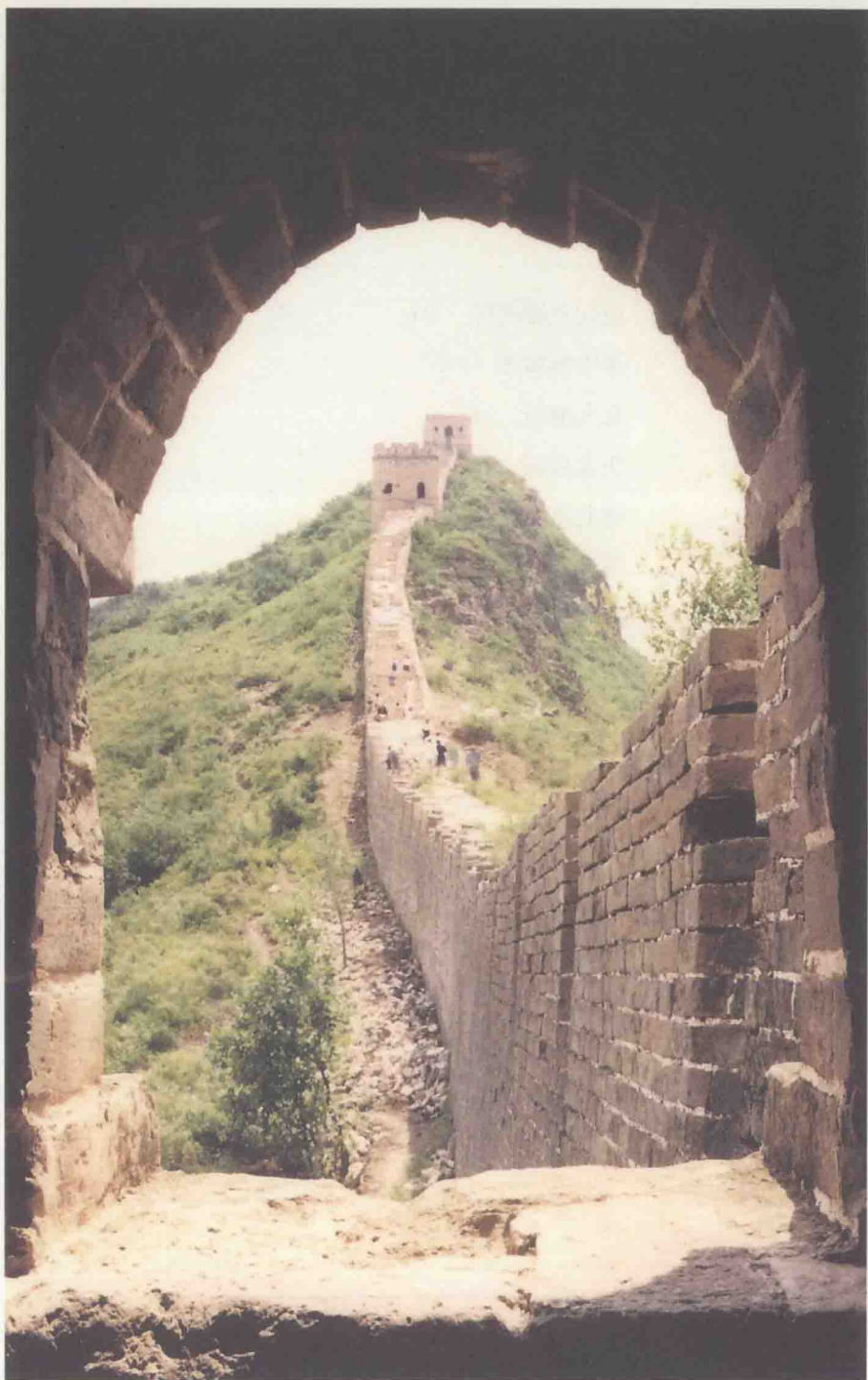
居住规模和房屋的大小，既反映了主人财富的多寡，也反映了主人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在现今所发掘的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和湖北盘龙城等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组织的宫殿区。这归然是统治者发号施令和日常起居的所在。而一般的平民住房，不但规模小、其建筑也简单。同样，墓葬的大小及其等级，也反映出了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若以殷墟的墓葬为例：带4个墓道的大型墓，已发现8座，墓主人是殷代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王；一般带一二个墓道的中型墓，已发现22座，墓主人是殷代社会中的大奴隶主贵族；长方形的竖穴中小型墓，已发现100多座，墓主人是商代社会中的中小奴隶；长方形竖穴小型墓，已发现3400座，墓主人是商代社会中的平民；无墓、圻墓、乱葬坑，墓主人应是商代社会中的奴隶。而在所有这些墓葬中，平民的墓葬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这各层级的阶级结构，说明“城市”在商代已经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代的都城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措施——城墙、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不仅已是某一历史时期国家或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而且也已是该国家、该地区实质上的经济中心。这就是说，它已经完全属于“城市”的范畴了。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言，还是从已经考古发掘遗址的形态来看，我国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在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即已出现最初的城市；而到了商代，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即已有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了。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在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化，既受到中原文化的强大渗透，又时时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而北京自周初分封，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即或从建金中都于北京迄今，也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它又是怎样从一个原始聚落、方国诸侯的领地中心，发展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北方地区的军事重镇，进而上升为全国首都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城的城市格局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规划建设的文化渊源又是什么？

北京所依傍的永定河虽然没有黄河那样雄浑，那样气势磅礴，并以她那滚滚的浊流孕育了华夏的千古文明；当然也没有像长江那样白浪滔天，一泻千里的气势，浩浩荡荡，激起神州大地多少文人骚客，留下万千脍炙人口的吟诵绝唱……但永定河却亦以母亲般的博大胸怀，以它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傲立于世界的文明之都——北京。🍵



目 录

■ 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

001

- 一 胸怀博大哺甘醇 / 002
- 二 园林本源古河床 / 011
- 三 桑千古湖泥河湾 / 020
- 四 万年遗址现平原 / 025
- 五 卢沟渡口卢沟桥 / 028
- 六 冰凌难逃“斩龙剑” / 037
- 七 北京城址傍卢沟 / 040
- 八 终使“无定”变“永定” / 045
- 九 城址变迁乃河缘 / 049
- 十 “高亮赶水”高粱河 / 056
- 十一 大都城建海子畔 / 061
- 十二 运河码头什刹海 / 067

